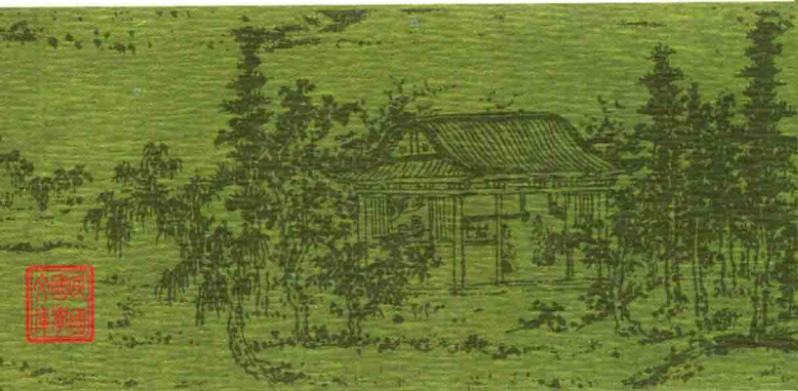


王安石文

褚东郊
万婵
选注
校订



長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書局

王安石文

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 XUE WEN KU

王安石文

WANG AN SHI WEN

褚东郊 选注

万 婵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安石文/褚东郊选注;万婵校订. —武汉:崇文书局, 2014.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54-3

I. ①王… II. ①褚… ②万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北宋 IV. ①I264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1389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王安石文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7.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54-3

定 价:18.0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己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 言

宋太祖鉴于唐代藩镇之跋扈，置转运使以掌地方之军需粮饷，又命文人以通判府州军事，凡可以集权中央者无不用其极。结果，藩镇之祸除，而国势日弱，外患不能御。真宗时之辽，仁宗时之西夏，迭扰边疆，岁糜巨帑。当是时朝廷上下，议战议和，图目前一时之苟安者有之，能具远大之见识，用精密之考察，通盘筹画，以谋国是者，王安石一人而已。惜当时在朝贤俊，墨守旧法，拘于成见，不肯和衷共济，对于安石所倡行之新法，抨击甚力。独木支大厦，识者早已知其难矣。是岂安石之不幸，抑亦宋朝之不幸也。本编所选注之安石散文八十五篇，不仅文学上之造诣足以上追韩、柳，即其卓绝之政见、特殊之个性，亦皆隐括无遗。今撮其平生事迹与新法之大略，缀而序之，以为读本编者之一助。

王安石之生平事迹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抚州临川人。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，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。与南丰曾子固相友善。子固携其文示欧阳修。修为之延誉，擢进士上第，签书淮南判官。旧制，秩满许献文求试

馆职，安石独否。调知鄞县。安石在鄞，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；又贷谷与民，约期立息以偿，俾新陈相易。邑人便之。既而通判舒州。文彦博为相，荐安石恬退，乞不次进用，以激奔竞之风。寻召试馆职，不就。欧阳修荐为谏官，以祖母年高辞。修以其须禄养，言于朝，为群牧判官，请知常州，移提点江东刑狱，入为度支判官，俄直集贤院，时仁宗嘉祐三年也。安石既入朝，鉴于财用之匮乏，边疆之败坏，官治之因循，人才之缺少，即有变法之意，上书言事，洋洋万言，传诵一时。其后安石当国，所施行者，大抵皆祖此书。

先是馆阁之命屡下，安石屡辞。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，恨不识其面。朝廷每欲俾以美官，患其不就。四年，命同修起居注，安石辞之累日。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。吏置敕于案而去，又追还之。上章至八九，乃受。遂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后以母忧去官。终英宗之世，不起。

安石与韩绛、韩维兄弟及吕公著三人相友善。神宗在藩邸时，维为记室。每讲说见称，维辄曰：“此非维之说，维友王安石之说也。”及为太子庶子，又荐以自代。神宗由是想见其人。甫即位，即命安石知江宁府。数月，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。熙宁二年二月，拜安石为参知政事。于是设三司条例司，兴农田水利，行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法，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。朝臣多反对之。七年春，罢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。八年复拜为相，九

年复罢。哲宗元祐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

王安石之政治计画

中国帝王为保持一家之王位计，多重文轻武，以弱人民。浸至外祸日逼，无法抵御。而以有宋一代为尤甚。宋于开国之初，燕云十六州之地，即未完全收入版图。再传至真宗，即有契丹入寇，澶州之盟。仁宗之时，西夏强盛，连年扰边。安石生当其时，目击心伤，思有以挽救之。于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，力言武事之不可偏废。其言曰：

先王之时，士之所学者，文武之道也。士之才，有可以为公卿大夫，有可以为士。其才之大小、宜不宜则有矣。至于武事，则随其才之大小，未有不学者也。故其大者，居则为六官之卿，出则为六军之将也。其次则比、闾、族、党之师，亦皆卒、伍、师、旅之帅也。故边疆、宿卫，皆得士大夫为之，而小人不得奸其任。今之学者，以为文武异事，吾知治文事而已，至于边疆、宿卫之任，则推而属之于卒伍。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，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，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。边疆、宿卫，此乃天下之重任，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。故古者教士，以射、御为急，其他技能，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。其才之所不能，则不强也。至于射，则为男子之事。人之生，有疾则已；苟无疾，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。有序之间，固当从事于射也。有宾客之事则以射；有祭祀之事则以射。别士之行同、能偶则以射。于礼乐之事，未尝不寓以射，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、祭祀

之间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？固以为射者，武事之尤大，而威天下、守国家之具也。居则以是习礼乐，出则以是从战伐。士既朝夕从事于此，而能者众，则边疆、宿卫之任，皆可以择而取也。夫士尝学先王之道，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，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、宿卫之事，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，而无内外之虞也。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，人主所当至慎之选，推而属之奸悍无赖，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，此方今所以譖譖然常抱边疆之忧，而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。今孰不知边疆、宿卫之士，不足恃以为安哉？顾以为天下学士，以执兵为耻，而亦未有能骑射、行阵之事者，则非召募之卒伍，孰能任其事者乎？

安石对于武事之意见既如此，及当国，即以保甲、保马二法，实行其寓兵于民之政策。

〔保甲〕籍乡村之民，二丁取一。十家为保，有保长。五十家为大保，有大保长。十大保为都保，都保有正副。保丁皆授以弓弩，教之战阵。

〔保马〕马为战阵必需之物。宋仍唐制，有马市，以金帛茶等物易西北诸胡之马。安石谋马之蕃衍，行保马法。凡愿养马者，户一匹，或以监牧中现有之马给之，或官与以值，使自市马养之。每岁阅其肥瘠，死病者责令补偿。

兵既强矣，当谋富国，安石富国之计画如何？曰重在整理财政，不重在增加赋税；重在补助生产，不重在横征暴

敛。其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中所谓：

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，而元元安土乐业，人致己力，以生天下之财。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，殆以理财未得其道，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。

与熙宁新法中之均输、方田二法，皆重在整理固有之财政者也。

〔均输〕宋太宗置江淮水陆发运于京师，漕运米粟。后兼领荆湖两浙诸路，或兼知制茶盐，或兼制置矾税。安石因以发运之职，改为均输，假以钱货，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，皆得徙贵就贱，用兵易远。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，得以从便变易蓄买，以待上令。

〔方田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，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。岁以九月，令佐分地，计量，验地土肥瘠，定其色号，分为五等。以地之等，均定税数。

其《与马运判书》中所谓：

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，不独费出之无节，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。富其家者，资之国；富其国者，资之天下；欲富天下，则资之天地。

与熙宁新法中之青苗、市易二法，皆重在补助人民之生产者也。

〔青苗〕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，散与人户，纳时令出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敛，五月散而秋敛。

〔市易〕置市易省于市使购市所不卖之物于官，或与官

物交换。又以资贷商人，以田宅或金帛为抵，当出息十分之二，过期不输，息外更加罚钱。

有善法而无相当之人才以奉行之，则法之效仍不见。安石于未变法之前，即已有见及此，故极力主张用人惟贤，反对科举之以言取士而不重实学。其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，曾再三申述此意。

朝廷每一令下，其意虽善，在位者犹不能推行，使膏泽加于民；而吏辄缘之为奸，以扰百姓……夫人才不足，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以合先王之意，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，而欲领此者，九州之大，四海之远，孰能称陛下之旨，以一二推行此，而人人蒙其施者乎？……

方今取士，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，谓之茂才、异等、贤良方正。茂才、异等、贤良方正者，公卿之选也。记不必强，诵不必博，略通于文辞，而又尝学诗赋，则谓之进士。进士之高者，亦公卿之选也。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，不足以取公卿，不待论而后可知。而世之议者，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，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，常出于此，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。其亦蔽于理矣。先王之时，尽所以取人之道，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。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，而驱天下之才士，悉使为贤良、进士，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，固宜为贤良、进士，而贤良、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。然而不肖者，苟能雕虫篆刻之学，以此进至乎公卿；才之可以为公卿者，困于无补之学，而以此绌死于岩野，盖十八九矣。

科举不仅不能得人才，且其所谓“以言取士”者，亦漫无一定之标准，而以有司之好恶为进退。启士人侥幸之心，堕志士奋发之气，莫此为甚。《进说》一文，曾慨乎言之，今节录如下：

古之时，士之在下者无求于上；上之人，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。古者士之进，有以德，有以才，有以言，有以曲艺。今徒不然，自茂才等而下之。至于明法，其进退之皆有法度。古之所谓德者、才者，无以为也。古之所谓名者，又未必应今之法度也。诚有豪杰不世出之士，不自进乎此，上之人弗举也。诚进乎此，而不应今之法度，有司弗取也……士之进退，不惟其德与才，而惟今之法度。而有司之好恶，未必今之法度也。是士之进，不惟今之法度，而几在有司之好恶耳。今之有司，非昔之有司也。后之有司，又非今之有司也。有司之好恶岂常哉？是士之进退，果卒无所必而已矣。噫！以言取人，未之失也；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谓名，是失之失也！况又重以有司好恶之不可常哉？古之道，其卒不可以见乎士也！

由科举而得之士，既如此不可恃，当以何术救济之？曰验之以实事而已。《论馆职劄子》中，安石曾拟有一种具体办法，可为举一反三之例。

臣愿陛下察举众人所谓材良而行美，可以为公卿者，召令三馆祇候，虽已带馆职，亦可令兼祇候。事有当论议者，召至中书，或召至禁中，令具条奏是非利害，及所当设施之

方。及察其才可以备任使者，有四方之事，则令往相视问察，而又或令参覆其所言是非利害。其所言是非利害，虽不尽中义理可施用，然其于相视问察能详尽而不为蔽欺者，即皆可以备任使之才也。其有经术者，又令讲说。如此至于数四，则材否略见，然后罢其否者而召其材者，更亲访问以事。访问以事，非一事而后可以知其人之实也，必至于期年，所访一二十事，则其人之贤不肖审矣。然后随其材之所宜任使。其尤材良行美可与谋者，虽尝令备访问可也。

王安石之个性

王安石当群疑众谤，孤立无助之秋，能力排大难，独行己见而无恐者，果何所恃而然邪？曰有特殊之个性而已。今试从本编所选诸文中，就其言论主张以研究其个性，如何？

（一）正直 吾人试读《答孙元规大资书》，觉其不亢不卑，于婉转之言语中，寓正直之态度。不畏巨室，可谓强项县令矣。再读《答段缝书》，觉其一方面为曾巩辩白，一方面承认曾巩避兄而舍及己所以不用文字规戒之故，不偏不倚，令对方无从置喙。

（二）强毅 《游褒禅山记》曰：“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。故非有志者，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、昏惑，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。尽

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。其孰能讥之乎？此予之所得也。”安石明知新法之难行，而卒毅然以行之者，殆亦所谓尽吾志也，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。

（三）尽责 安石行事，不肯苟且，责任心甚重。知鄞县时之兴农田水利，行青苗法；由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之敢缘使事所及，冒言天下大事，皆其例也。而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之“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。某则以谓，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受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，同俗自媚于众为善。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。”尤足以表明安石责任心之所在。

以上仅就安石之生平、政见及个性略述之，至其文学上之造诣，足以上追韩、柳，下方欧、苏，前贤早有定论。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自能神会，兹不赘。

褚东郊序于上海

1927年1月26日